



依田憙家著作集(二)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

[日] 依田憙家 / 著
卞立强等 / 译

RIBEN DIGUOZHUYI YANJIU

 上海远东出版社



依田憇家著作集(二)

K313.42

Y513.91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

[日] 依田憇家 / 著
卞立强等 /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24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日)依田 憇家著;卞立强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依田 憇家著作集;2)

ISBN 7-80661-765-5

I. 日... II. ①依... ②卞... III. 日本-侵华-研究
IV. K26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752 号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

依田 憇家著作集(二)

著 者 / 依田 憇家
译 者 / 卞立强等

责任编辑 / 潘龙杰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中出版社
(200336)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中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刷 厂 /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37 千字
印 张 / 9.125
插 页 / 1

ISBN 7 - 80661 - 765 - 5

K·24 定价: 19.80 元

出版说明

依田憇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一位热爱和平、长期致力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罪行进行研究批判和揭露的进步学者，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和中国史学界有着较高的声望。

依田憇家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在其著述中从多层面探讨了日本历史的演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深入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战争罪行，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依田憇家所占有的大量史料，许多为国内学界少见，其不少观点也自成一家之言，可供国内学者研究和借鉴。这些均是我们出版其著作的原因。

依田憇家毕竟是生活在日本的学者，他在研究中日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时，有些看法，与国内学界有所不同，我们出版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我们的观点与其完全一致，而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大的原则的前提下介绍一家之言。另外，本译文集也以译者注的形式，利用手头现有的中方资料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补充说明，以便读者全面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某些有特定政治涵义的用语（如近现代史上日占时期的“满洲国”、“关东都督府”等），或加脚注予以揭露，或加引号以示其伪国家、伪政权的本质；再如书内满、台、港等中国地区往往与朝鲜、日本乃至中国交互并列，均作必要处理以正视听。至于所引文献资料原文而涉及此类问题者，作为史学译著存其原貌，当然不代表我们和依田先生的立场和态度。

总 序

卞立强

依田憇家先生 1931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牛込区(现属新宿区)早稻田南町,上的是早稻田小学。二战期间,东京遭到美军大轰炸,他回原籍长野县避难,上了故乡的初中,高中是在早稻田大学附属高中上的。1951 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东方史专业。毕业后又读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1966 年进入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助教、讲师、副教授到 1995 年升任教授;1998 年随着早大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早大亚太研究中心,转任该中心及该中心研究生院的教授,直至 2002 年退休;现为早大的名誉教授,并个人创办了日本史研究所,仍然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他从小就生活、学习、工作在早大的自由清新的学术氛围中,一辈子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一心追求学术的真理;有时他自己也自嘲是繁华的大东京中的“城市隐士”。我想这是依田其人及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特征。

依田先生主要生活的 20 世纪的后半期,是激烈动荡的时代。他继承了早大民主与进步的传统,从大学时代就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特别是日中友好运动,1970~1978 年曾担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常任理事。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他特别致力于中日民间学术交流的活动,数十次来中国访问、讲学,促进了早大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建立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与此同时,他在日本热情接待和亲切照顾了许

多中国的访日学者和留学生,有些留学生就直接受教于他的门下,为中国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可以认为,他作为一位民间人士,在促进中日友好和民间学术交流以及为中国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他仍然身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以及湖南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顾问教授,每年都来中国讲学,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学术交流,继续发挥“余热”。

依田先生研究的学术领域是日本史。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进步的唯物史观,批判反动的皇国史观和近年来猖獗一时的所谓的“自由史观”。运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资料,正确阐述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揭露了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朝鲜的残酷的剥削、掠夺和侵略。本文集卷一收录的《简明日本通史》,是依田先生在中国讲学时所使用的讲稿。已故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准确扼要的评价,并推荐说:“这部书既可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对日外事工作人员检阅和参考。”卷二《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着重从经济上揭露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的资料、统计和图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资料,然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轻轻点上几笔,勾画出侵略者险恶狠毒的用心和狰狞面目,反推出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卷三中收录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论述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在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朝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也在中国、朝鲜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卷三中收录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和卷四《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全面现代化时期,作者新撰的论著。后者是学术专著,前者通俗易懂地概述了后者的主要内容。两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背景的“异”与“同”,特别强调了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性的差异。它们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卷五《近代日本的历

史问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其中涉及明治维新、天皇制、自由民权运动以及战前日本的殖民政策、军部独裁等近代日本史中的重大问题。《战后教科书问题》一文中,揭露主审教科书的文部省(教育部)文教官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反动的皇国史观的传统。这表明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屡屡发生,日本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五卷文集收录了依田先生关于日本史和中日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对中国友好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相信文集的问世对我国日本史的研究会有所参考、启发和促进。广大读者通过文集可以认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异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从而加深对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的理解。我要向年逾古稀的老朋友依田惠家先生的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祝愿他老当益壮,不断地有新的著述问世。

这部文集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邹韬奋纪念馆馆长雷群明先生以及复旦大学教授蒋凡和陆康强先生也对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集的译文除我翻译的外,还收录了其他许多先生的译文。在汇编时,我作了若干校改,并统一了一些词汇的译名。其责任当然由我来负。如有错误,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3年9月11日

于上海旅次

代 序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消了三百年来的割据统治，成立了统一国家。接着又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以“明治宪法体制”的形式，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国家的体制，正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到20世纪初叶，成为亚洲唯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在国家形态和经济形态上基本上采用了近代的形态。但与此同时，在国内残存着君主专制体制，以低工资和半封建的地主佃农制为特征；对外方面的重要特征是侵略朝鲜和中国。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在初期主要被认为具有军事价值，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变成获取实行总体战体制所不可缺少的物资的基地，接着在其被占领后，成为总体战体制的典型地区，竟被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中战争的直接根源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成为道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即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形态变成国家总体战，在经济上增强了垄断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勾结。田中义一在出兵西伯利亚时担任陆军大臣，后来担任首相后，立即出兵山东，并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了侵略中国的方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说：“今后的战争和以前不一样，不单纯是军队对军队、军舰对军舰的作战，而是全体国民的战争。”在派往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中，也多次出现了这样的主张。

在日本的军部首脑之间,就这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确认了总体战的思想,认为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原料的自给自足”。当时日本组成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军部领导阶层,正由以前的旧藩阀过渡到士官学校派阀。新抬头的军部领导阶层都标榜要实现适应总体战的国家统治体制而崭露头角,其中之一是当时参谋本部少校,后来曾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他根据1915年8月至1916年9月赴热河、蒙古视察旅行的结果,写成所谓《帝国国防资源》的报告,呈交其上司,并得其上司批准,广为散发。小矶的这个报告是最早、最系统的争取实现总体战体制的方案。其要点是实行国家权力与民间资本相勾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针,从平时就争取国家与民间资本相结合,散发国家资金,进行“劝诱保护”、“委托制造”和“调整能力”,主张实现这样的体制的前提是确保控制中国特别是满洲的资源。也就是说,根据小矶的看法,为了确保日本今后在世界上“一等国”的地位,实现总体战体制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因而必须加强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同时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这样的方针从1920年度开始表现为各年度的“军需工业动员计划”,其中始终强调要确保控制中国东北、华北的资源。

当时构成日本统治体制的因素是官僚、军部、垄断资本和政党。他们相互之间虽存在着重大的对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而激化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深化中,把实现总体战体制当作解决这些矛盾的共同纲领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一方针上起主导作用的军部的内部,统制派企图通过现存体制,加强在其中的领导权来实现总体战体制;皇道派则无视现存体制,企图通过“非常”手段,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独裁政权,以此一举实现总体战体制,两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另外在垄断资本的内部,有满足于以前的既得权益的财阀系统的垄断资本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依据新的产业部门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垄断资本,他们之间对总体战体制的反应也不一样。这样的对立和矛盾也反映在官僚和政党

势力的内部,出现了种种的动向。但上述实现总体战体制的方针毕竟可以成为当时面临危机的日本统治势力的共同纲领,终于把军部捧上了政权的宝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势力虽然一度取得了进展,而且统治势力之间也蕴含着相当激烈的对立,但结果还是转向“举国一致”。这与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抬头也有关系。另外这一方针的实行,在军部的内部是在“统制派”占优势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是因为明治宪法本身具有在不废除它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法西斯主义过渡的性质。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由军部发动的。当时虽说基本的方针已定,但在统治势力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对立。所以九一八事变首先是由“军部独断独行”的形式推进的,是为了取得实现总体战体制的前提,同时又是以否定“政党内阁”和推进“统制经济”为中轴而进行的。但是,它是遵循整个统治阶级的共同纲领进行的,所以一旦迈开了步伐,就使得所有统治势力都转向这个方向。日中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是由于军部的阴谋而如此推进的,在体制上依旧原封不动,计划主要是在军部内部制定的。但到第二阶段,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计划方面,都是在比第一阶段完备得多的情况下推进的。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接着准备侵略华北。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当时日本国内的矛盾,不但没有通过占领中国东北而获得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日本的资源政策中早就列入了要获得华北的资源;要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必然要提出其邻接地区华北的问题等。

1932年10月,天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委托“满铁”进行调查,其中心有三点:战略资源的确保、结成所谓“日满华经济区”的准备以及对华北的经济控制。要求调查事项的重点是:“天津可否作为河北的吞吐港,或另寻其他港口”;“根据决定的港湾位置,其腹地的铁路设施应如何进行”;“华北金融市场与上海的依存关系及能否分离”等。这可以说是表露了要在日本的控制下,重新改组

整个华北经济的意图。

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迅速地侵入了天津等华北各地。天津是中国民族资本纺织业的中心，以前没有日本资本的纺织工厂。现在日本乘着中国资本丧失东北市场的机会，截至1935年已将天津四家公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分割华北通过以下活动而具体化：1935年10月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年年初“满铁”的《关于对华经济工作方针》中所主张设立的“兴中公司”当年8月获得日本总理大臣的批准，12月于大连设立。

另外日本政府方面，1936年8月由总理、外务、陆军、海军四大臣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中称：“对华执行政策的重点是，首先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并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同时要使整个中国反苏亲日。”为了使这一方针具体化，同月日本政府有关各省（即“部”）之间决定了《对华执行政策》和《第二次处置华北要纲》。特别是后者称“分治的地区最后为华北五省”，当前“倾注主要力量使冀察（河北、察哈尔）二省明朗化和完成分治”。并谈到了华北的“分治”、资源的控制以及整顿铁路网，和上述“中国驻屯军”的方针政策完全一样。接着这一方针在1937年4月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决定的《华北指导方策》中再一次得到确认。

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前夕的统治华北的设想，包括政府、垄断资本、军部在内，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相比，战争的直接契机不明。但从整体来看，七七事变远比九一八事变更有计划性和必然性。

目 录

代 序.....	(1)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	(1)
第一节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对中国的侵略.....	(1)
第二节 帝国主义的成立与对中国东北的入侵.....	(4)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	(10)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	(15)
(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	(15)
(二) “总体战”体制与中国的资源	(20)
第五节 总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2)
第六节 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东北殖民地化.....	(26)
(一) 殖民地政策的确立	(32)
(二) “特殊会社”与殖民地经营	(34)
(三) 从占领中国东北到卢沟桥事变	(40)
(四) 所谓“日满华经济区”	(44)
第二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经济工作”及 “华北开发计划”.....	(49)
第一节 “华北经济工作”的前提.....	(50)
第二节 正式推进“华北经济工作”的时期“中国 驻屯军”的“华北经济工作”方案	(54)
第三节 “华北分离工作”与“日满华经济区”.....	(64)
第四节 “华北分离工作”进展的时期.....	(71)
第五节 占领华北前夕的时期.....	(75)

第六节 “卢沟桥事变”后的“经济工作”方案·····	(83)
----------------------------	------

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占领地区的经济

统治:关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设立·····	(87)
第一节 统治华北占领区的前提·····	(87)
(一) 日本军占领华北与“接收”中国资产·····	(87)
(二)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母体——兴中公司·····	(89)
第二节 占领地区经济统治基本政策的制订·····	(90)
(一) 基本方针的制订·····	(90)
(二) 向日本输送资源数量的估算·····	(94)
(三) 经济计划草案的制订·····	(96)
(四) 计划方案的调整·····	(99)
第三节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设立·····	(101)
(一) 同子会社的关系·····	(101)
(二) 流通部门对策·····	(103)
(三) 华北占领地区的地位·····	(105)
第四节 有关占领地区统治的各种问题·····	(108)
(一) 关于外国资本的对策·····	(108)
(二) 关于控制煤矿的经营形式·····	(109)
(三)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设立·····	(114)
第五节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结构·····	(118)

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劳动统制:

关于大东公司的成立·····	(123)
第一节 中国东北与华北外出劳工·····	(123)
第二节 关于可否引进华北劳工的论争·····	(127)
第三节 关于劳动统制的论争·····	(131)
第四节 根本方针的决定·····	(136)
第五节 必要人数的推断·····	(140)

第五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中国东北推行移民	
的真相:关于移民团的犯罪行为	(145)
第一节 由掠夺土地而引起的事件	(146)
第二节 对中国人施加的暴行	(158)
(一) 强制服劳役	(158)
(二) 出于对中国人的所谓“恐怖”	(159)
(三) 出于对中国人的优越感	(160)
第三节 移民团内部的矛盾	(169)
第六章 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	(179)
第一节 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过程	(179)
第二节 《三矢协定》的缔结与朝鲜移民地位的恶化	(191)
(一) 《三矢协定》的成立	(191)
(二) “压迫朝鲜人”事件的发生	(193)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推行侵略中国东北政策 与朝鲜移民问题	(196)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以前东北境内 朝鲜农民的存在形态	(204)
(一) 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的存在形态	(204)
(二) 间岛的朝鲜农民	(211)
(三) 间岛朝鲜人的土地问题	(214)
(四) 地主佃农关系	(223)
(五) 间岛以外地区的朝鲜农民	(231)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与万宝山事件	(239)
第六节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与朝鲜移民	(248)
(一) 占领中国东北后的朝鲜移民政策	(248)
(二) 集团部落的实际状况	(258)
(三) 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境遇	(271)
附 记	(278)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

第一节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对中国的侵略

明治维新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其动力是反对封建统治和殖民地化的人民斗争。但人民未能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因而在掌握权力的日本统治阶层中，早就存在着企图牺牲朝鲜、中国等亚洲国家，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的想法。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们的老师，曾给明治以后的日本统治阶层带来很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就曾宣扬：“俄美一定讲和，决不能由我破之，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厚信义，在其间以养国力，割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贸易上失之于俄国，土地上应从鲜、满补偿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于1871年仿效欧美各国强加给清朝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要求清朝政府缔结同样的条约，但遭到失败。欧美各国曾经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而现在日本反而要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这就是明治初期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基础。当时在日本的统治阶层中发生的“征韩论”，也是同样路线的产物。而日本政府在“征韩派”离开之后，仍然发起了江华岛事件，进攻朝鲜，并以此为借口，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朝鲜。由此可知“征韩派”和“非征韩派”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在实行的时期上有分歧而已。而且在“征韩派”离去半年后，日本政府为了转移人们对“征韩论”的视线，于1874年4月借口所谓杀害冲绳渔民的事件，向中国的领土台湾出兵。这不论是作为近代日本第一

次向国外派兵,或向后来为日本所侵占的台湾入侵,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

这时日本已经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这个运动的动力是幕府末期和维新时期以来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要求社会近代化的斗争,同时也是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企图挤进统治阶级行列的资产阶级的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表明,参加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革新行动,但他们害怕人民革命的高涨,在政府的怀柔政策面前妥协了。这也表现为他们的朝鲜观和中国观带有根本性的弱点。

1881年,面临自由民权运动的人民斗争的高涨,明治政府为了保护统治的宝座,宣布10年后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并从这时开始,改变以前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的政策,向民间抛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企图从上面一举制造出顺从于权力的大资产阶级,分给他们一部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开始背叛人民的革命的要求,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协助推行侵略政策。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确定了法国对越南的统治,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间,法国曾一度入侵台湾,当时还是自由民权运动家的尾崎行雄却说:“以今日之形势推之,台湾岛终将非中国之所有。……取之者可控御东海,在东亚有非常之势力。台湾岛的取舍,我辈政治家决不可等闲视之。”日本的统治阶层认为夺取台湾是成为亚洲强国的一个条件,流露了对中国台湾的领土野心。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认为日本比中国、朝鲜优越,是在于“脱亚洲之固陋,移西方之文明”。并说:“今日为谋,我国不应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之犹豫,毋宁脱其伍,与西方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亦不应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效西方人对待其方法而处理之。”福泽曾对日本的近代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他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却认为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优越。这样的思想与后来日本甘当欧美帝国主义的“亚

洲宪兵”的方针是一致的。

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时日本正同欧美各国交涉改正幕府末期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企图打败在朝鲜问题上对立的中国,提高国威,并从中国获得有利的“权益”,以此来充当欧美帝国主义的尖兵,使改正条约能取得成功。当时英国同日本的关系最密切,也是日本要求改正条约的主要的对象国。英国因侵略亚洲的问题正同沙皇俄国对立,因此在远东需要日本的协助;另外,日本如打败中国,根据最惠国条款,英国将会获得比日本更有利的“权益”,所以它支持日本,同意改正条约。日本一接到英国同意改正条约的答复,立即开始了战争。

在日清战争的议和中,日本把完全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中国,领先各国夺取了长江的航行权和资本输出权。日本本身当时积蓄的资本还未达到向国外输出资本的程度,在很久以后才行使了这一权利。因而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权利,首先是由享有最惠国条款的欧美各国行使的。另外日本乘着胜利,非法宣布中国的领土钓鱼台群岛为日本领有,强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因与俄、法、德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对立,不久被迫归还中国),索取高达3.45亿日元的赔款。赔款成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制的基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过,大部分赔款变成军事费用和皇室财产)。对于中国来说,则成为继续向欧美各国借款、经济进一步衰退和进一步从属于欧美各国的原因。

发动日清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是天皇制政府,但新兴资产阶级也大力支持了战争。战争一开始,福泽谕吉就宣称:“此次战争关系到能否成为东方文明的领袖。”他向政府捐献了当时的金额一万元日元。战后他鼓吹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之胜利”,“有生之年,有此见闻,其愉快与幸福,实难言传”。另外,福泽的弟子、民党的领导人尾崎行雄更妄言:在日清战争中的1895年“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的利益,也是中国民族的幸福”。这表明了上述“脱亚论”的